

林圣智：《平阳县反右派斗争始末》（中国共产党 / 平阳党史数字化系统 1992）

一、反右派斗争的开展

1955年冬和1956年春，平阳县掀起合作化高潮，所有低级农业社都合并成几百户，甚至千多户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取消了土地分红。1956年平阳又恰逢几十年一遇的大旱，从端午节开始放晴连续83天未下滴雨，因此影响了农业的收成。可是县里的征购任务丝毫没有减少，因此很多乡镇购了过头粮。所以1957年4月份左右，农村即开始闹粮荒，有些农民要求退社，有些地方要求返销粮，并不断开始闹事，规模较大，情节严重的，甚至冲击乡政府，殴打干部的有万全石圪，鳌江墨城，宜山湖前等地。

1957年，党中央在整风运动中认真听取了党外人士向党提出的批评意见，还特别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。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利用这个机会，以“大鸣”、“大放”、“大民主”为借口，公然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质疑。6月，党中央为此发出了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，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从此开展起来。6月19日，中共浙江省委发出《关于动员工人、农民讨论和驳斥右派反动言论的通知》。此后，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全省各县展开。

1957年春的农村闹退社、闹粮食、闹事冲击政府，殴打干部，因为正在传达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件，所以县委领导也只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，只能做说服教育工作，没有捕人镇压。到宜山湖前闹事时，全国开始反击“右派”，上级态度也起了变化，认为内部有坏人操纵，就开始捕人镇压了。中共地委指派一名副专员，他姓牛我们都叫他“牛专员”，坐镇鳌江百货公司楼上。各区、乡（镇）将报告，审批表报上，“牛专员”批准，检察院奉命办理批捕手续即可抓人。我当时在城南乡（万全、鳌江撤区并成大乡）担任党委书记，也抓住机会将平塔陈交垟村的一个社员陈□□报上，因他在前段闹事中到乡政府吵闹，乡副书记陈克模批评他几句，他竟然冲向陈，并用嘴将陈的肩膀咬了一口。我拿到检察院的批捕证后，第二天清早也没有去找公安警察，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去陈交垟村找到他家，他老婆说，陈到城里菜场去买菜秧了，因此我骑车，马不停蹄赶到城关菜场边找到他，就把他带到平阳看守所关进去了（以后他被判三年徒刑），这次批捕全县不下百人。

紧接着在全国开展反击右派的形势下，农村也开展大批判，大斗争的反右运动。当时城南乡在平一中礼堂召开千人大会，批斗了三个参与闹社，闹粮的成份不好的农民，批斗后口头宣布他们为“右派分子”。那么当时农村批斗了多少人，是没有数字统计的。不过1957年春的闹事经过捕人镇压，又开展大批判、大斗争，农村形势平静了，干部的积极性也高起来。

1957年7月中旬，中共省委派工作组进驻平阳，带队的是省委委员、省农工部长吴植椽，他在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传达了省委的指示，农村只开

展社会主义、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，不开展反右派斗争，前段农村闹事，闹社的都不是什么右派分子。因此平阳的区、乡基层单位，以及农村就没有进行反右派运动，那些前段被批斗的都不是什么右派。

真正开始反右派是全县的中小学教师学习班。1957年的7月底，暑假开始，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1,500多人在平一中和县小。开始先进行肃反，反胡风学习，县委成立以副书记孙洁为首的5人领导小组。根据上级指示，到8月20日转入整风反右学习。首先被揪斗的是黄菽民，他原为民主人士、平一中校长，1956年被选为副县长，分管教育工作。因他新组建了农工民主党平阳支部委员会，自任主委，所以抓住批斗他招兵买马，组党与共产党对抗，批斗会的实况经平阳广播站向全县播放，9月中旬在政协二次会议上进一步批斗他。在近一个月的反右中，揭发出多个右派小集团，如董宝昂集团（董为湖前小学校长），反出几十名右派分子。约9月份，县机关和各单位也开始反右派，第一个作为典型批斗的是游寿澄，他当时是教育科（局）的中教股长。接着政法、农业、财贸金融、包括鳌江的十大公司，有些工矿企事业等单位都进行了反右派斗争。

1958年一月份，省委召开党代会，会议也进行了整风反右，把省委常委、省长沙文汉，省委常委、副省长杨思一，省委常委、省检察长彭瑞林，省委委员、省财贸部长孙章禄四人打成右派，并在《浙江日报》上刊登。接着温州地委也把副专员徐寿考，农工部副部长吴佩芝打成右派，在《温州日报》上公布。那么平阳县委也于1958年的2月17日（春节）开始召开千人的三级干部大会。会议期间也进行整风反右，原方案并报地委批准将县长白希曾、副县长林克己、蔡炳治等3人打成右派。可是这次会议省委派省组织部长郑平参加会议，他看了材料后，认为白希曾是烈士后代，林、蔡等也只是工作上与县委领导一些矛盾，不属于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右派，因此把他们三人保护下来。县委临时决定将城南党委书记林圣智、金乡区委副书记邹雅正作典型，在1958年3月1日晚上，会议总结大会前宣布戴上右派帽子，并在3月9日《平阳报》上刊登。

经过半年多的整风反右运动，虽然中央下达反右六条标准，实际上是非常草率的，有的先宣布戴帽，然后去调查搜集材料；有的提领导或书记意见，就是反党；有的说粮食不够吃，就说是反对粮食统购统销；有的说农村有缺点，就是反对合作社，反社会主义制度；总之现在看起来是非常荒唐的。总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知识分子，可抓住一点，不及其余。所以反右的结果，是把各部门、各单位的思想比较活跃超前，平时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业务骨干，党内精英统统打掉。如教育系统平一中校长黄菽民、教育局局长赵洪靖、中教股长游寿澄，知名县小学校长陈培根、宜山小学校长吴明允、湖前小学校长董宝昂。另如平一中教师姚亦菲、二中陈镇波、三中胡步勋、平师许统会等，他们都是学生公认尊重的知名骨干老师都戴上右派。农业系统（仅有的）2名农业大学毕业的技术骨干陈庚、方瑞棠也打成右派。

我当时在平阳知名度也是很高的，曾多次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作典型发言，也是区委书记中唯一被任命为参加县委为委员。1957年春天农村较为混乱，教师中议论较多，平一中要求县委宣传部领导作形势报告，因我那时正在坡南工作，所以推荐我去讲。1957年6月份的某一天晚上，平一中和县小教师近百人，集中县小邀请我去作形势报告，我实事求是的分析1956年因旱灾歉收，统购任务偏重，部份生产队购了过头粮，造成部份人缺粮是客观存在的。合作化与东欧国家对比，他们早5年解放，合作化也只占农户的60%，现在我国合作化百分之百，速度明显过快，农民觉悟跟不上，干部管理水平难以适应，这也是事实。在一次县委扩大会上发言，我也暴露了这些认识。可在县委讨论定右派时，一位县委副书记李□□说：“把林圣智打成右派，在全县影响大、震动大。”好像完全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。

又如金乡区委副书记邹雅正，他是一位山东籍的南下干部，来平阳不到8年，到平阳后很快学会了平阳方言，到桥墩工作学会了闽南话，到金乡工作又学会了江南蛮话。他不仅一般的可以与群众直接交流，而且可以用三种方言在大会上作报告。温州地区上千南下干部中难能再找出一个同他一样的，若不是深入群众，是难以学得那么好，所以大家都非常佩服他。1957年春天县委召开座谈会，他在会上向县委提了18条意见，这些意见无非是说县委存在官僚主义，也是很忠恳，哪会是反党的。

又如尤文贵，反右时是龙泉县（市）文化馆的文艺干部，1956年该县少数领导竟擅自决定拆除北宋时期的千年古塔，利用旧砖块修街路。他发现后追回贮藏塔内的经卷13卷，并把情况报告给省委宣传部和中央文化部。可是1957年反右运动受到严重报复，竟说他利用拆塔事件进行反党活动，把他夫妻双双打成右派，送湖村农场劳教。

又如詹振权，反右时他是杭大二年级的学生，平时喜欢画图画，一天偶然看到报纸一幅漫画，他随便在热水瓶包装纸上照样画成一幅老和尚跪在地上，有人说这个人物特征与学校一位领导很像，以后被诬为有意丑化领导，也被打成右派。

从1957年8月份开始至1958年上半年基本结束，但1958年下半年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后，整党交心中，有些单位为了凑足5%的比例仍补划一些人，甚至1959年1月还有补划的。反掉最多的是教育系统，其次是农业系统中的农技干部。根据《平阳县志》记载全县共划右派分子206人。

二、反右派的处理情况

反右运动是从整党突然转入反右，开始时也没有标准，事先没有设定什么处置办法与方案，各地反后等待上级指示处理。1958年5月份，中央下达划分右派分子六条标准，中央下达指示，右派性质是敌我矛盾，但要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。因此少数内定为极右的送劳动教养，百分之六七十，开除公职回原籍监督劳动，只有20%左右，保留公职送农场或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，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8元（后增至12元，15元）。到1959年10月，建国十周年，

中央宣布对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犯实行大赦，包括溥仪、杜聿明等，对个别认为表现好的右派进行摘帽。平阳县于1960年4月初在党校集中召开全县的右派分子大会，到会有200人左右，会期三天，是县委组织部主持。张尔祥副部长作动员报告，然后分组讨论如何加强学习积极劳动，好好改造思想。大会还宣布三位表现好的右派摘帽，一位右派陈志清（商业局），说他改造表现不好，送去劳动教养，以杀鸡儆猴。会议结束前，组织部曾善都副部长进行会议总结。

全县右派大会后，把分散在各地监督劳动，保留公职的每个月有生活费15元的右派分子，全部集中到苍南桥墩水库工地参加劳动（在桥墩莒溪林场监督劳动的右派没有集中），共有30多人，分为3个小组，一个组分在麻步营，2个组分在万全营的城西连和城南连。当时桥墩水库已开始堵口，要求在汛期到来之前大坝筑高36米以上。工地有全县各地民工5,000多人，每天两班制，每班劳动12小时，拉车填土，劳动强度实难忍受。虽然是大兵团，高强度劳动，工效仍不理想，到1960年8月初大坝高度仍达不到要求，溢洪道仍然没有筑好，难为避险。8月初一次台风袭击，雨量不是太大，经努力抢险，没有溃坝。不到一星期，又一次强台风正面袭击我县，并带来300多毫米的暴雨，不知那位领导说：“现在大坝已非常危险，眼看库内水位节节升高，即将漫顶溃坝，所有右派必须带离大坝。”

8月10日凌晨4时，库内积水终于漫过坝顶，大坝顷刻被冲塌，几千万吨洪水一泄而下，桥墩边上的小山被冲走一半，桥墩镇上两条街，千多户居民房屋被冲得片瓦无存，南港地区成一片汪洋。一小时后天亮时，洪水退后，坝前工地一片狼籍，裸尸到处可见，惨不忍睹。我们在此劳动的30多位右派出险前都逃往高坡安然无恙，当时在麻步营劳动的小组10多人，宿舍稍高财物没有什么损失，在万全营劳动的20多位右派，衣物日用品，甚至连笔记本被大水冲得荡然无存。当天连食物也没有，我们依靠飞机空投，分得一包饼干充饥。指挥部决定所有右派都不准离开工地，所以第二天就去清理大水冲过回流的物资，开始搭建新的工棚。我们这批受灾的右派，丝毫也没有一点补助与救济。

1960年9月份，平阳公安局在万全湖岭乡江潘村宝兴寺创办湖岭农场，把留在机关、企事业、以及集体单位内的所谓“五类份子”都集中在这个农场劳动，便于管教控制。因此在桥墩水库劳动的30多位右派，于水库出险后的42天，即60年9月22日，从桥墩转到万全宝兴寺。除右派外，还有矾山矾矿中的五类份子40多人，昆阳、鳌江各个单位100来人，还有桥墩碗窑的一些人，共200多人，分为4个大队，大队下分为若干小组。当时这些右派是比较有才能的干部，就成为这个农场的骨干，都当大队长，小组长。场部公安局派5名干部领导管理。

万全乡是渔米之乡，平阳的粮仓，可是在1958年反右、大跃进，1959年反右倾，大公社、大食堂等左倾路线折腾下，一边饿死人，天天听到锣鼓送葬声，一边是土地荒芜无人耕种，在江潘村前一片几百亩土地，竟成废墟，荒草连片。因此我们农场开始即在这片土地上，锄草、烧泥灰，准备种蔬菜，油

菜，大麦等冬种作物。当时农村虽然一片惨状，可是县委领导还是说形势一片大好，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，谁也不敢把这些饿死人，荒芜土地的负面材料暴露出来，去污蔑三面红旗、社会主义制度。

1962年2月，我们国家经历了大跃进、大饥荒的困难时期后，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，各地县委书记都去参加，总结几年来的工作。在这次会议上几十年来，第一次听到毛主席有一句自我批评的话，他说：“前几年有些工作的失误，我也是要负主要责任的。”这次大会后，环境稍为宽松，农村贯彻三自一包政策，提出前几年受错误处分的干部，可以甄别平反，可是内部又规定戴上右派帽子的一律不准甄别，右派被排除在外。这时中苏的矛盾也已公开化，《人民日报》连续发表了“九评”文章，揭发苏修，认为中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的。所以这段时间，右派也有所宽松。

1962年5月份县里把在湖岭农场劳动的30多名右派都集中到县招待所，学习一个星期左右，主要是学习中苏论战“九评”等文章，学习后作鉴定，约有20多人摘掉右派帽子，并作出处理，少数的降薪降职安排出路，如鳌江公司企业的业务人员是仍回原单位工作，原行政机关的有去当教师，有安排大集体工厂的。多数下放农村回家支农，自食其力，停发生活费，不留公职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到1962年10月份，中央八届十中全会，又提出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，右派又升级了，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一次讲话中就提到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成为五类分子之一。到1966年文革开始，右派虽已成死老虎，有的仍被当作运动员，照样受冲击批斗，有的虽摘了帽，身份仍没有改变称摘帽右派。

总之对右派的处理虽然说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但还是比较严厉的。据调查了解，平阳（含苍南）县共反出右派225人（其中属苍南籍62人），降薪降职安排工作的只有17人，占8%弱，被处理劳动教养的27人，占12%，还有3人经不起批斗打击投河自杀，有4人屈死于劳改场，如原广播站编辑梁亦秋，开除回家粮食困难，到福建山区卖蕃薯丝被诬粮食投机，送去临海凤凰山农场劳改，饥饿难忍，把民警食堂鱼类肚内流到阴沟的也抓来吃，结果贫病交加，得不到治疗，屈死在凤凰山无人知晓，子女幼小，老婆没有饭吃，无人领尸。剩下的178人都是被开除回家，或称下放支援农业，占将近80%。而且有的处理得很冤屈，如章锦发反右时为公安队文教，档案处理决定是经温州专署批准，保留公职劳教三年。可是劳教期满摘帽，劳改单位联系平阳人事科，却不接受安排，他老家是上海市区人，又进不去，这样在劳改单位整22年，就像判无期徒刑，直到1979年4月才回到平阳公安局，重新安排工作。反右时才25岁的小青年，回来时已47岁，开始组建家庭，到现在儿子要成家，爱人又病发，处境仍然十分困难。

三、反右的平反与改正工作

1976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1月、6月、9月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相继去世，10月党中央粉碎了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，1977年全国开展“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大讨论，1978年又进行批

判“两个凡是论”，因此全国人民冲破禁区开始纠正 30 年来“左”的路线。

1978 年 4 月份，中共中央发出（78）11 号文件，“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”，因此全国各级党委相继成立右派改正办公室，开始审阅档案，调查摸底，宣布摘帽。到 1978 年 9 月份，中央组织部在山东烟台召开有关反右的专题会议，并发出（1978）55 号文件，明确 1957 年错划的右派分子要做好甄别改正，重新写出结论。特别是 1978 年 12 月份，中央通过新华社发布两则消息，一是 1957 年中央党校共反“右派”94 人，除 2 人尚在调查核实之中，其余 92 人，全部摘帽，甄别改正，重新安排工作。二是公安部 1957 年反出右派 74 人，除 1 人重新犯罪，2 人尚在调查核实，其余 71 人全部摘帽重新安排工作。这两则报导震动了全国，为全国右派改正工作树立了榜样，使原来一些“左毒”严重的领导思想认识也有了转变。

1978 年 12 月份，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，这是我党历史上的大转折，会议决定解放思想，转移重点，摒弃阶级斗争，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。特别是为 1959 年的庐山会议，处理彭德怀、黄克诚、张闻天、周小舟四位同志作出平反的决定，开始拉开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。

1978 年 5 月份，平阳县委成立右改办公室，原统战部长蔺德甫担任“右改办”主任，开始时他思想还比较保守，他对我说：右派改正后，一是一律要到基层去工作，二是都要当职工安排，反右六条标准有一句对号，你还是右派。可是到 12 月份，新华社报导中央党校和公安部右派处理情况后，特别是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彭、黄、张、周四人的平反决定后，平阳县委思想受到影响变化是很大的。

1979 年 1 月份，平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，原原本本的贯彻中央三中全会精神。当时县委书记张维森，在大会报告中宣布对林克己（原副县长）、王羨军（原城区区委书记）、杨化岳（原城郊党委书记）、林圣智（原城南党委书记）四位同志的平反决定（其中前 3 人是受党纪处分，1 人戴右派帽子）这也为平阳县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出榜样。因此，1979 年的 2 月 15 日，县委下达正式文件，给我恢复公职，恢复党籍，恢复原工资待遇行政 18 级，4 月份报经地委批准，担任麻步镇公社党委书记。到 1979 年 5 月份全县 200 多位被反的右派，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安排，原来是教师的，都仍回学校，原来是机关，企事业单位的都回原单位安排工作，个别亡故的，也写出改正结论通知家属。

但是当时“右改办”指导思想的转变也是逐步的，开始时很多同志的改正结论是留有尾巴，如□□□同志 1957 年在整风运动中有些错误言论，但不属于右派言论。以后中央听取各地反映下达通知，因此又发了第二次改正结论，明确为错划，把错误言论的尾巴去掉。这批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也都积极工作，有的做出成绩得到提拔重用。如陈庚反右时原为农业局的技术股长，改正后选为副县长，人大副主任，苍南的林成夫反右时原农业技术员，后选为政协副主席。詹振权反右时为杭大学生，平反后经努力，提为平师校长、教授、温师院

的院长等。

今天离“反右”运动已过去 53 年了，很多同志已经离开人世。据不完全了解，平阳当年被错反的有 225 位同志，其中有 39 人现已办理了离休，目前健在尚有 69 人，占总数的 30% 强。但是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是有惨痛的教训，因为当时处理很“左”，保留公职，安排工作的只有 8%，92% 的被开除公职（其中还有夫妻右派两对、兄弟右派两对、父子右派一对），又适逢三年灾害时期，所以有 3 人经不起磨难而自杀，有 4 人受病饿屈死于劳改场，也有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的。特别是还有两位同志，当年因为右派身份受到刑事处分，右派改正平反时又因法院不肯撤消刑事处理，以致右派得不到改正而安排工作，现在已进入高龄期而领不到养老金，这很不公平。现在我们国家已进入改革开放，经济腾飞的时代，党中央领导已明确健全法制，依法治国、摒弃阶级斗争，提倡科学发展观，创建和谐社会，决不会重蹈覆辙。